

严小香 著

修辞

语用范畴实践研究

xiuci yuyong fanchou shijian yanjiu

严小香 著

修辞

语用范畴实践研究

xiuci yuyong fanchou shijian yanjiu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辞语用范畴实践研究/严小香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22-8236-5

I. ①修… II. ①严… III. ①汉语—修辞—语用学—研究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522号

修辞语用范畴实践研究

© 严小香 著

编辑室: 高校教材分社

责任编辑: 姜正平 张晶晶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销售电话: 027-67861367 (发行部)

邮购电话: 027-67861321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定价: 32.00元

电话: 027-67867364

责任校对: 刘 峥

邮编: 430079

传真: 027-67863291

电子邮箱: press@mail.ccnu.edu.cn

督印: 王兴平

印张: 11.25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甘 英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本课题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回答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关键词是“修辞语用”，回答了修辞学和语用学是否能够结合的问题。

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学科归属、研究领域、共性和个性等问题是近 30 年来学界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定论的问题。具体来说，大致有这样四种观点：（1）认为修辞学与语用学在研究的对象方面虽有部分接壤，但各自有很不相同的本体假设、研究目标和取向，不宜强行将两者结合；（2）认为修辞学与语用学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少不同之处，但分属两个学科；（3）认为修辞学是语用学的一个分支；（4）认为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因目的相近，故而殊途同归。本课题研究从广义修辞学的视角，认为二者在某些共通的范畴上是可以结合的，并用具体的例子证明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第二个关键词是“范畴”，回答了修辞学和语用学在哪些研究领域可以结合的问题。

广义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交际双方（两个主体：表达方/接受方）在一定语境中的建构活动，涉及三个层面的建构：修辞技巧层面的话语建构方式、修辞诗学层面的文本建构方式和修辞哲学层面对参与人的精神建构。因此，修辞不再是狭义的修辞格研究，不局限于话语表达者对文辞的修饰，而是文本的构成方式，甚至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看来，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结合大有空间。本课题主要在话语标记语、语体、修辞变异和句式变异、言语风格以及反讽、隐喻等具体修辞方法和修辞行为等范畴领域，探讨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第三个关键是“实践”，回答了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问题。

本课题研究以实践为导向。这里的实践是指，将修辞学与语用学相结合的可能范畴应用在实践中，用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如为了证明话语标记语具有修辞功能，我们选择了“也是”和第二人称“你”作为话语标记语的用法，探讨它们的修辞功能。修辞方法和修辞行为也具有语用功能，我们选择了反复、借代、双关、隐喻、转喻和反讽进行探讨。我们以张爱玲小

说的蒙太奇句式 and 变异修辞、“在 N 里”结构和并列复句的变异为例探讨了句式变异和修辞变异的语用功能。语体和言语风格本属于修辞学的重要范畴，本课题也以张爱玲小说为例，探讨了语体交叉渗透的认知功能、篇章功能等语用价值，修辞活动对修辞主体语用形象的建构功能。

本课题研究修辞学和语用学相结合的可能领域：一方面研究语用的修辞功能，另一方面研究修辞的语用功能，但立足点是修辞学，因此，后者是研究的重点。从广义修辞学的视角和晚近语用诸理论来看，修辞学与语用学有诸多结合部，本课题选择的范畴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范畴还有待深入研究。本书除导论外，另有六章，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章探讨话语标记语的修辞功能。话语标记语一直是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大概有语篇连贯、句法语用、认知语用、元语用等研究视角。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去掉话语标记语并不影响该话语的语法正确性，也不影响其命题内容，但却影响其语用得体的性和社会层面上的人际适应关系。这一事实表明，话语标记语具有一定的修辞功能。本课题将以“也是”和第二人称“你”作为话语标记语的用法，来探讨话语标记语的修辞功能。

第二章探讨修辞方法的语用功能。修辞方法即传统所说的修辞格。修辞是艺术，应用于各类语篇之中，折射不同的语用价值。语言形式是认知、语义、语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课题将探讨反复、借代、双关等辞格的语用价值。

第三章探讨修辞行为的语用功能。本课题将修辞作为一种活动，视为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是修辞学与语用学的重要结合部，言语行为理论既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又涉及很多修辞问题。如格赖斯的很多准则跟修辞格有关，可以用来解释隐喻、讽刺、夸张等修辞现象及其修辞效果。本课题将以言语行为的“语力”概念为基础，探讨隐喻、转喻、反讽等修辞行为对文本的建构功能及语用价值，探讨它们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对故事世界的建构功能及其对文本主题的意义。

第四章探讨修辞变异和句法变异的语用功能。变异会带来不同的表达效果，因而具有修辞性。文学文本中的修辞变异和句式变异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话语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作者特有的言语风格。同时，变异不仅仅具有修辞上的表达效果，更重要的是有一定的语用功效。修辞变异是对语言规则的灵活运用，是有意对语言规则有所超越的修辞行为，是有目的、有限制的语言应用。修辞最重要的功能是语言表达功能，它通过使用某种特定的变异句式来表达更为深刻的语义内容和变化无常的语气，使人们的言语表达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因此，从本质上真正决定修辞句法变异交际价值的，不是修辞句的表面语

言形式而是修辞句的本质语用意义。修辞句的产生和理解过程都必须遵循其语义指向,句子的语义指向引导修辞的句法变异。句法变异的修辞的最终目标不是语言符号表面的形式意义,而是蕴藏在话语中的本质意义。变异句式关键在于能创造出灵活多样、新奇独特的言语使用方式,给语言使用主体提供了破旧求新的机遇,得到别具一格的语用效果。句法变异在修辞上艺术表达效果的增强正是其语用功效的体现。

第五章探讨语体交叉渗透的语用功能。不同的语体因为交际区域和交际任务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语风格特点,各语体之间具有排他性。但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同的语体之间会发生交叉渗透的现象,一种语体借用其他语体的一些专用表达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语体交叉渗透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技巧。文艺语体相对于科技语体、公文语体等而言是一种开放性的语体,往往会主动地借用其他语体的要素增强修辞效果。小说是文艺语体的下位语体的成员,一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会选用语体交叉的修辞方式,提高语言的艺术魅力。同时,语体交叉渗透在小说中也表现出很强的隐喻功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对比功能和篇章功能,小说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进一步确证了语体交叉的隐喻功能和语用功能。本课题将以张爱玲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语体交叉渗透的修辞性及其语用价值。

第六章探讨言语风格与语用形象。言语风格是语言运用中语言要素本身的特点和所运用的语言表达手段的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气氛和格调。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作家言语风格的独特性主要取决于其独特的言语方式,即其在进行文学话语活动时对语气、语调、语音、词汇、句式、句法以及修辞手段的独特选择和习惯性运用。言语形式与话语主体之间有某种性质的联系,言语形式也与文化语境之间有某种性质的联系。作家作为话语主体,不是把存在之现实转化为抽象的表述,而是把现实世界通过语言的处理转化为似真甚至失真的修辞世界。作家独特的言语风格既是作家个体独特的修辞系统,也是作家精神个体性的体现,因此,言语风格必然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审美感知、文化语境等有密切联系。作家总是以特定的语用形象而在场,言语风格就成了作家语用形象的烙印。作为非可视性的文学作品,作家语用形象的介入往往是通过语气、语调、语音、词汇、句式、句法以及修辞手段的独特选择等来实现的。从修辞表达来说,作家有意或无意将自身植入了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言语风格;从修辞接受来说,读者通过作品的言语风格建构了作家的语用形象。本课题以张爱玲及其作品为例,探讨作家言语风格的语用价值。

本课题研究旨在表明,修辞学和语用学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本课题研究也为中国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个案材料,以促进修辞

学的发展。

本书是本人近 10 年研究的总结，也参考了本人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叙事与言语行为”（11CZW003）的研究成果。本人学术水平还比较低，书中疏漏之处颇多，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严小香

2018 年 1 月 19 日于黄石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学科渊源	2
第二节 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研究领域	8
第三节 修辞学与语用学结合的可能性	14
第一章 话语标记语的修辞功能	22
第一节 “也是”的话语标记性及其修辞功能	23
一、“也是”的篇章功能	25
二、情态功能及其修辞效果	29
第二节 “在这里/在那里”的主观化及其修辞性	33
一、F 结构主观化为语气标记的句式特征	34
二、F 结构主观化为语气标记的虚化机制	38
三、F 结构主观化的语境	42
第三节 第二人称有标记用法及其修辞动因	45
一、第二人称有标记用法考察	47
二、第二人称有标记用法的运用基础	51
第二章 修辞方法的语用功能	54
第一节 反复与话语蕴涵	54
一、场景重复	57
二、话语重复	59
三、故事重复	62
第二节 借代辞格产生动因及语用价值	64
一、原型模型与借代辞格	65
二、转喻与借代辞格	66
三、心理语境与借代辞格	67
四、借代辞格与语用效果	69
第三节 双关的语用价值	70

第三章 修辞行为的语用功能	73
第一节 言语行为理论：修辞行为的理论基础	73
一、奥斯汀：言语行为及其分类	73
二、塞尔：意义与意向	76
三、格赖斯：会话蕴涵理论	79
第二节 隐喻的语篇建构功能	81
一、塞尔和格赖斯的隐喻思想	81
二、隐喻与故事结构	82
三、隐喻理解与语境	84
第三节 《台阶》：转喻与文本意义的生成	86
一、桃与柳的不同文化品格	88
二、桃、柳与父亲的生存感受	90
第四节 《阿Q正传》：叙事反讽的符号化结构及其文化意义	92
一、人物话语的反讽	93
二、叙述者话语的反讽	96
三、叙事文的结构反讽	98
第四章 修辞变异和句法变异的语用功能	101
第一节 蒙太奇句式及其语用价值	102
一、蒙太奇句式的特点	102
二、蒙太奇句式的语用价值	104
第二节 变异修辞的语用效果	108
一、超常组词	109
二、词语的超常搭配	110
第三节 句式变异的认知价值	111
一、P结构变异运用的结构分布情况	112
二、P结构变异运用中的语义变化情况	113
三、对P结构变异运用的认知	115
第四节 并列复句变异应用的修辞性与语用价值	118
一、平列句式的变异	118
二、对照句式的变异	120
三、句法变异的语用目的	123
第五章 语体交叉渗透的语用功能	125
第一节 语体交叉渗透的修辞效果及其认知动因	125
一、语体交叉渗透的修辞效果	126

二、语体交叉渗透的修辞价值的认知动因	129
第二节 语体交叉渗透的语用功能	131
一、小说中运用语体交叉渗透的表现方式	132
二、小说中语体交叉渗透的功能	133
三、小说中语体交叉渗透功能的认知语境	136
第六章 言语风格与语用形象：以张爱玲为例	139
第一节 词语的选用	140
一、用词博采众收，异彩纷呈	140
二、大量运用描绘性词语	143
第二节 句法与句式的选用	150
一、句法结构的特点	150
二、句式的特点	152
第三节 修辞方式的选用	156
一、比喻形式的多样性	156
二、苍凉：喻体的选择	158
三、喻义的特点	161
第四节 言语风格与修辞主体语用形象的建构	164
一、外在言语环境与个体言语风格	165
二、内在精神世界与个体言语风格	167
参考文献	169

导 论

近 30 年来,中国修辞学界一直在反思自我和寻找突破,其出路之一就是运用新入境的语用学理论改造汉语修辞学,或者将两者“联姻”,构想出“接受修辞学”“修辞控效说”“语用修辞学”甚至“修辞语用学”。这些问题都与论者所持的对修辞学、语用学及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有关。

通常修辞学,是指为了把话说好、把文章写好而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的种种努力,是说写过程中那些为了实现最佳表达效果而努力的活动。修辞活动有一些常用的、效果明显的方法、方式,以修辞格为突出代表。

对于语用学的定义,国内外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总体说来,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在一定语境中如何使用,涉及语言输出与语言理解两个方面,当前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五个方面:言语行为、前提、会话含义、指别语、会话结构^①。

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结合是语用学多维发展的产物之一。语用学和修辞学的“联姻”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大量的期刊论文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何自然的《语用学对修辞研究的启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等,也出现了不少研究专著,如《语用·修辞·文化》(彭增安著,学林出版社,1998年)、《修辞语用探索:语言表达与得体性》(马庆株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语用修辞探索》(李军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语用修辞研究》(许钟宁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趣谈——汉语修辞格的语用艺术》(陈丛耕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等。大体看来,两个学科的关系有“同源说”“异质说”“合流说”等不同的观点。学界基本认可两个学科虽有区别,但联系密切,语用学可以为修辞学提供新的理论养分,修辞学也可以为语用学提供支撑,二者可以互相借鉴。如格赖斯讨论量准则违反时,提到了比喻、反语、夸张等修辞格。里奇早期的语用研究路径是修辞性的:从修辞学角度研究语用学。20世纪末以来,汉语修辞学界出现了西方语用学界的众多术语:“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言内行为”“言外行

① 侯国金. 语言学百问和硕博指南 [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为”“言后行为”“构成性规则”等。奥斯汀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效行为”对西方修辞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章探讨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学科渊源和研究领域,以及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第一节 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学科渊源

自从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问世,修辞学和语用学的关系便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对这两个学科的特征、论域、研究视角、学术历程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促进学科发展大有裨益。本节探讨两个学科的发展渊源,以期从源头考察二者的同与异。

修辞学的渊源笼统地讲有中国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所以有中、西两个不同的源头。

中国的修辞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之前,我国就有关于修辞的记载了。最早把“修辞”二字连用的是《周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是修饰文辞的意思,修辞的“辞”可以分为文辞(写文章所用的)和言辞(或称语辞,口头说话所用的)。最初的修辞和语言一样,重心在说话方面。“辞”最初是指言语,而非文字的组合格合(《说文解字》:“讼辞也。”),后来重心才向文辞发展。

先秦时期,先秦诸子有许多关于修辞的零星论述,如《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随后还出现了古代修辞学的第一篇专论——《墨子·小取》,它是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第一篇论文,一开头就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模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又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这里谈了论辩的作用与方法,着重于谈口语“辩”的作用与方法,说明了修辞的目的和功能在于表情达意。这也说明中国最早的修辞是口头的修辞,讲究说话的技巧和策略。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修辞学著作:先秦的《鬼谷子》是我国第一部口语修辞著作;宋代陈骙的《文则》是我国第一部书面语修辞专著;而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但其中夹杂着大量的修辞学内容^①。

① 高圣林,《鬼谷子》: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最早源头——兼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比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86-89.

《鬼谷子》是中国修辞学著作最早的源头，它涵盖了20世纪末修辞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因而是一部蕴涵丰富修辞理论的著作。《鬼谷子》为修辞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待验也”（《权篇第九》）。该定义阐明了什么是修辞，既谈到了目的，又说到了手段；既谈了对语音的要求，又谈了内容方面的标准。《鬼谷子》不仅提到表达修辞的原则，如“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常人反之”（《权篇第九》）。也就是说，见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而且，还谈到接受修辞原则，如“人言者，动也；已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欲闻其声反默”“故用此者，已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摩篇第七》）。《鬼谷子》是站在纵横家的立场上撰写的，为达到政治目的，要求修辞表达者准确揣摩君王心理，因此，其理论显得比较粗糙，不关注修辞系统本身，仅是关注表达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独立，因此对语言形式愈发重视，这是《文心雕龙》修辞内容出现的重要背景。《文心雕龙》通过对文思、风格、辞格、声律、篇章修辞等的研究，集中表达了作者的修辞思想。“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这说的是思想内容与文辞之间的辩证关系。《附会》和《章句》阐发了篇章修辞的要义，要根据内容情理来确定纲领，使之统率文章命意，统领首尾段落。同时，《文心雕龙》也有关于修辞主体的探讨，既探讨修辞主体的心理状态，也谈到修辞主体的才能、性格对作品风格的影响。《文心雕龙》还有对比喻（《比兴》）、夸张（《夸饰》）、对偶（《丽辞》）、摹状（《物色》）、讽喻（《谐隐》）等辞格的论述。《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的大背景上探讨修辞，从语句到谋篇布局，从文本到主体，刘勰的修辞思想已不是口头语言修辞，而是修辞规律，因此对修辞理论的研究更细致，特别是对修辞主体意识的关注为后世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修辞埋下了伏笔。

《文则》以《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左传》《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古典经籍为修辞研究对象。《文则》继承了中国传统“修辞立其诚”的思想，重视言辞伦理内涵，要求言辞应符合伦理道德标准，提出“辞以意为主”、为文应自然的修辞原则。《文则》非常重视字词在修辞上的作用，如《庚一》指出“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文则》也对比喻、蓄意、继踵（相当于层递格）、对偶、交错、重叠、反复等辞格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文则》通过对经典典籍的观察来总结归纳修辞规

律,以书面语表达为理论出发点,是我国第一部书面语修辞专著。

总之,《鬼谷子》《文心雕龙》《文则》三部著作,从为政治需要到为文艺评论,到为修辞规律而著书,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自觉意识逐步增强,修辞学研究从随意性、附属性走向了稳固性、独立性,从多维度走向语言本体,从粗线条到深入细致。这标志着修辞学正在逐步走向独立、专业和科学^①。

中国古代修辞学是在对经文典籍的解释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现代汉语修辞学是在唐钺、陈望道等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陈望道先生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他在充分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修辞学思想^②。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等方面的新开拓。陈望道先生明确指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即“修辞现象”。“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多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③ 1932年问世的《修辞学发凡》就提出了修辞研究应该“以语言为本位”的创见,接着又提出“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④“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⑤的新观点。这是陈望道对修辞学学科性质认识的重要发展。陈望道开拓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修辞学研究范围涉及语言交际全过程,既包括话语发出端(表达),也包括话语接受端(理解)。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奠基基于对古今中外遗产的继承上,把握了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新见解,开拓了新思路,引领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

英语“rhetoric”源自希腊语“rhetōr”,意为“演说者”——演说艺术的需要。西方修辞学的理论经历了2500多年的历史,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古典修辞学,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其理论基础,理论总体框架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基本修辞思想所组成。当时的修辞术是为演说术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演讲种类、演讲的论证方法、修辞三段论等。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这种修辞力量是可以让修辞者经过学习和训练得以运用的一种个人能力。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修辞学就对话语的分类、适合的情景、话语的作用等进行了探索和规定。修辞有三大使用场所:法庭演说(forensic oratory)、政治演说(deliberative oratory)、仪

① 高胜林,常晓玲.中国古代三大修辞著作——《鬼谷子》、《文心雕龙》、《文则》之比较[J].毕节学院学报,2009,27(10):1-4.

② 宗廷虎.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5-119.

③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43.

④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300.

⑤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302.

典演说 (epideictic oratory)^①。任何演说情景都包含演说者、演说内容和演说受众,其中,演说受众是演说的目的所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修辞家研究的主体是演说和论辩,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也就此展开^②。在古典修辞学理论中,修辞学强调的核心是劝说,论辩是其主题,认为劝说主要是通过说理和辩论来实现,演讲者根据劝说的内容、目的、对象及情景场合生成论辩话语,通过演讲传递给观众,听众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接受演讲者的劝说,因此论辩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演讲的效果。

西方修辞学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对修辞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关注于为国家 and 人民获利益、造福祉的功能上。如西塞罗认为,政治教育与演说教育是相同的,他主张通过普及演说家教育使罗马贵族承担起保护国家的责任,为国家更好地服务。西方修辞学发展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时达到鼎盛,人们甚至认为对修辞的掌握是受教育的一个标志。其代表人物苏格兰神学家和修辞家乔治·坎贝尔 (George Campbell) 提倡科学修辞,把修辞学和心理学联系起来研究演说受众的情感、心理及反应。其著作《修辞原理》既保存了心理精神层面的实质,也为 20 世纪新修辞学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资源^③。

20 世纪西方修辞学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超越性发展的趋势。修辞学已经超越纯语言研究范畴,其作为语言活动和行为的功能得到突出强调,一方面其作为论辩的传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发挥了修辞的认知功能、社会建构功能、表演功能等,从而使修辞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发生了联系。总体上看,20 世纪新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发展趋势: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修辞作为论辩的古典传统;研究范围以及实用功能的多元化,新修辞理论不仅提出了多种新观点,而且,显现出修辞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及其实用价值;新修辞学将话语看作一种社会行为,不仅运用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理论,而且应用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阐释人类情感与行为的动机;注重修辞过程,强调交际的互动性;强调修辞的认知性,认为修辞不只是使真理更有效,而且具有认知功能^④。可以看出,新修辞学的发展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联姻”提供了可能。

综上,中国修辞学和西方修辞学在源头上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点:其一,都

① 曹德和. 关于修辞理论的深度思考:从修辞学基本概念的界定谈起 [J]. 学术界, 2008 (5): 85-96.

②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49-71.

③ 柴改英, 张翠梅. 从修辞学定义管窥西方新修辞学的特点和发展动态 [J]. 修辞学习, 2007 (6): 21-24.

④ 鞠玉梅. 从西方修辞学的新理论看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1): 63-66.

是一种说的艺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揭示修辞现象、修辞观念的系统,运用各种修辞方法恰当地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其二,大体上都经历了从口语开始,到偏重书面语,再到口语与书面语并重,同时兼顾修辞接受研究这样一段历程;其三,在源头上,中西修辞学都看重其实用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修辞都具有工具性。

语用学是一门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用学一开始是在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到后来才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语用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很快就掀起了一股语用学热。但是许多国内的语用学著作还是停留在对国外语用学理论的介绍和描写上,书中所用的例子也大多是外语例子。由于语用学是一个舶来品,它不同于修辞学,有古代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所以语用学的本土化是中国语用学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所谓语用学是指语言实用学,在英语中,它同哲学上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个术语有相同的拉丁词根(pragma-),表示“行动、做”这个意思。语用学最早的定义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说,“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语形学(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而语用学则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后来,罗斯、莱昂斯等人从意义理论的观点出发,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意义的学问,主张语用学在语义学的统称下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到了80年代,语用学的地位又有了变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语义学中分了出来,并且出现了两种见解,形成了两种学派。

在英美分析哲学中,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论,在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奠基的作用。以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人们用来相互传递信息的手段,它不仅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人的全部活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人们使用语言进行形形色色的活动,如命名、描述、提问、命令等,就像人们可以用棋子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一样,因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语言游戏理论”。他在《哲学研究》中说:“符号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它在使用中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抑或使用就是它的生命?”^①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直接为语用学所吸收,成为语用学的理论基石,确立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使用

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50.

中的语言，同时直接为言语行为理论播下了种子。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话语都是在实施行为，至于话语具体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以语境来确定，而且，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实施不同的行为。塞尔继承并发扬了奥斯汀的观点，提出了间接行为理论，即说话者通过实施某种言语行为可以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另一位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即说话者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他的字面意义，而是他的意图。他进一步提出了人们言语交际中要普遍遵循的原则——合作原则。

语用学的另一根基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当时盛行的“刺激—反应”论的影响，从行为主义的角度考察意义问题，成为语用学的催生素。其代表人物皮尔斯主张把意义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一个概念的全部意义就是这个概念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的总和（即一套有成效的习惯）。在他们看来，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于，语言表达式在特定场合下在听话者的机体上所引起的反应，或者在听话人的脑海里引起的某种不外漏的行动倾向。在以上理论的影响下，莫里斯提出了符号行为理论，强调符号的意义就是控制人的行为，强调研究符号与符号理解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将语言的理解者纳入语言研究范围，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对符号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这个贡献的意义是深远的，因为它导致了“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的提出：1938年，莫里斯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 pragmatics 这个概念，他将符号学分为三个部分：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至此，我们可以说，在哲学这片肥沃的土壤里，语用学萌芽了。

一般认为，1977年第一部语用学杂志 *Journal of Pragmatics* 在荷兰的正式出版发行，1983年第一部语用学专著 Levinson 的 *Pragmatics* 的出版以及1986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语用学学会的创立，这三件大事标志着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得以确立^①。《语用学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以哈勃兰德和梅共同署名的社论：《语言学和语用学》。社论用“语言的语用学”这个术语来表明“语用学”跟历史上“符号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差别，以此强调语用学的语言学属性。社论指出，“我们希望用内部和外部两种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外部方式，即“人们能从语言的具体实践（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实际运用）的观点来界定语言的语用学”；内部方式，即“语言运用的这门科学在本质上能被看作研究制约语言使用的那些条件”。“语言的语用学是研究自然语言

① 何自然，吴亚欣. 语用学概略 [J]. 外语研究，2001（4）：10-16.